

论屈原与《离骚》的政治思想

—— 读《离骚发微》札论

叶剑英同志诗云：“泽畔行吟放屈原，为伊太息有婵娟。行廉志洁泥无滓，一读离骚一肃然。”这首诗对屈原的精神和品格，以及他的不朽著作《离骚》作了极高的评价。

屈原名平，贵族出身，战国时楚国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他在流放中，面对当时政治的腐败、国运的危殆，十分担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，心情抑郁、沉闷，写了许多沉痛的诗篇。《离骚》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。

古今论者一般都主张屈原是一个“伟大的诗人”、“伟大的爱国诗人”、“伟大的文学家”。诸如南齐沈约在《宋书》中以从前诗人“莫不同祖风骚”来概括他们的渊源关系；汉司马迁以“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”来激励自己；唐代大诗人李白在《江上吟》中推崇屈原说：“屈平诗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。”杜甫也曾经把屈原的成就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之一。今人更说“屈原的作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”、“无不引起历代有良心的诗人、文学家的敬佩、同情和自勉。”所有这些主张，其共同之处都在于肯定屈原主要是一个诗人、文学家。这是传统的观念，我看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。

我们认为，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，其次才是一个诗人

和文学家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主要讲屈原的政治地位、政治主张，以及他的政治活动。不过，“屈原的政治，出于屈原的学术，其政治的来龙去脉，亦即其学术的来龙去脉。屈原在怀王左右，受到严重的谗毁，在楚国贵族社会里，遇到严重的孤立，都是由于政治和学术的原因；最后的沉湘，是殉楚国。殉楚王，也是殉他自己的政治和学术。”（魏炯若《离骚发微》第127页）所以，我们又认为

《离骚》不仅是一般高于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所谓辞赋之祖，尤其其它的思想内容，更说明它是文学史上空前的政治辞赋。政治这是《离骚》的骨髓；忽略这一点，就无从谈对屈原和《离骚》进行研究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中说：“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。”他为什么“忧愁”？原来是因为“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。”（同前）所以“《离骚》者，犹离忧也。”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”（同前）不过，这里的“离”并非指屈原的放逐，显然是指被“疏”，被“离间”之后的忧愁哀怨。也就是说，屈原首先是搞政治的，如“为楚怀王左徒”、“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，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”等等，但是，他在政治上碰了壁，然后才试图以文学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。所以，我们说屈原《离骚》的核心是讲政治，至于那“丰富的想象力、鲜明的个性、诚挚的感情、多样的形式、绚丽的语言风格，以及神话传说的运用”等等，只不过都是包裹着这政治内核的艺术外壳。

东汉王逸在《离骚序》里说：“《离骚》之文，依诗取兴，引类譬喻，故……灵修。美人，以媲（比）于君，宓妃、佚

女，以譬贤臣，……”说“美人”者，如以“鸾皇”“凤鸟”、“灵修”、“巫咸”等来比喻那些耆老重臣；而说“香草”者，则以“众芳”比喻尧舜，以“蕙茝”比喻桀纣。这种以“美人香草”引类取譬的方式，后来便成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种传统的艺术手法。

《离骚》是屈原全部作品中最长的一篇抒情诗，全诗共三百七十多句，二千四百九十多字，不但规模宏伟，而且内容复杂。尽管如此，但归结起来都不外乎向楚王解释他的政治主张和施政方针，以及这些主张和方针的重要性，并且提醒怀王要警惕祸国殃民的奸佞“党人”。

“杂申椒与菌桂兮，岂维纫夫蕙茝”是讲政治，是“固众芳之所在”的具体政治措施。

“彼尧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”是讲政治，即提倡“光明正大”的政治，而“不要搞阴谋诡计”的政治。这是屈原政治的理论根据。再如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”的“中情”也是讲政治，正因为屈原主张设“四辅”而限制了楚王的言语行动，所以才遭到了“反信谗而齎怒”的结果，这又是屈原主要的政治措施。另外《离骚》后半篇的“往观四荒”也是讲政治，这是后半篇的纲领。“佩缤纷其繁饰兮，芳菲之其弥章”。这是说要使他“好修”的政治面貌更加鲜明。女媭骂他“汝何博謇而好修兮，纷独有此姱节？”也是为他政治上的“好修”。女媭劝他“蓺茝施以盈室兮，判独离而不服”，也是叫他在政治上随波逐流。而他向重华陈词的一大段话，从反面集中地指出“夏康娱以自纵”、“后辛之菹醢”等失败的教训，并举出“举贤授能”、“循绳墨”的两条成功的经验。所有这一切，都说明屈原“往观四荒”是去观察政治，是去求索实现他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
综上所述，屈原“继承古代合理的政治思想：如尧舜的‘耿介，（光明正大）；禹、汤、文王的‘纯粹，（‘众芳所在，，举用一切有德有才的人材）；他的‘好修，（政治上首先要约束自己），又来自楚国的先贤彭咸”。（《离骚发微》第17页）在《离骚》中，绝大部分篇幅是写屈原的政治理想，所以，应该说《离骚》是一篇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辞赋。；

《离骚》作为长篇政治辞赋，它“感情真挚，构思奇特，气魄雄浑，词藻丰富，韵调铿锵，形式自由，在中国诗史乃至世界诗史上永放光芒。”（郭沫若《屈原赋今译》序）它“有时象怒海狂涛，汹涌澎湃，有时又象清风煦拂，微波涟漪。内中既有冲淡清新的神奇幻想，又有上天、下地，冲高山，向大海的磅礴气势。然而，海语难解，白云空飞，又产生了凄迷的春愁，萧条的意境，铸成了《离骚》浓郁隽永的独特风格。”（同前）尽管如此，但是它毕竟不是“修辞发凡”，更不是“艺术指南”，它是讲屈原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的生平事迹。屈原忧国忧民，他为了国家的安危，甚至置个人祸福而不顾。他在《离骚》中写道：“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。”又表示为了国家的振兴、人民的幸福，宁愿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他还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”此外，他还在《哀郢》中说：“皇天之不纯命兮，何百姓之震愆？民离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东迁。”这些也都是屈原忧国忧民的真实写照。

楚怀王无论从军事、政治，还是从外交方面看，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昏君。这点屈原也有一定的愤慨，甚至是大胆地揭露。但是，当他知道怀王被劫留，秦国要求他割地而能“怒不听”时，便认为他还有一点国家观念，因而又表示要

“眷顾”。怀王客死秦国后，屈原便行吟泽畔，弄得形容枯槁；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，楚国被秦将白起攻破都城，屈原便于是年五月五日抱石怀沙，饮恨投汨罗而死。《离骚发微》说：“屈原的政治地位并不高，汨罗江在当时又是极其荒僻的地方，一个人在这样荒僻的地方投水死去，会震动全楚，其震波甚至冲决时代的堤防，在楚灭亡之后还不停止，这不能说是仅仅由于他那一死，也不会是仅仅由于他写过《离骚》这样的伟大作品，看来他在楚国的政治方面能得人心，也是重要因素之一。”（《离骚发微》第25页）这显然是从政治角度来看《离骚》的。《离骚》的内容，写了屈原和楚王斗和“党人”（上官大夫靳尚、令尹子兰、南后郑袖等）斗，不但如此，还百转千回地写自己的思想斗争，都有他的政治目的。一言以蔽之，无非是“冀幸君之一悟”，希望“俗之一改”，乃至本人重新取得楚王的信任。总的看来，尽管屈原出身于贵族，他和《离骚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；如“在为楚国这个大前提中间，为怀王、为知己这样的消极因素，仍然不能排除。”（《离骚发微》第28页）但是，他“为了楚国的前途而斗争”的精神，以及“政治第一的作风，死不离楚国的气节”（同前）却证明屈原是进步的，是一个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人物。而他的长篇抒情诗《离骚》也“突破了个人小圈子而成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。”（同前）

屈原之所以不肯离开祖国，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“为了楚国”，另一方面，则是为了学术。“为楚国，是想用楚国经营天下为所学是大一统的学说。”（《离骚发微》第125页）曾经喧嚣一时的论调，说什么屈原反对秦统一六国，也就是反对“大一统”的统一天下，妄图借此否定屈原和他的《离骚》。其实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我赞成魏炯若先生的说

法：“关于统一中国，在当时有资格争衡的，只有秦楚二国。屈原不愿去助秦国，可能和他是楚之同姓有关；也可能和他学术上的传授，以及在学术上的素所蓄积有关。”

（《离骚发微》第125页）况且，屈原维护楚国，这也是在热爱祖国的前提下去考虑大一统的。倘以此给屈原定罪，并且还要彻底否定他，显然是没有道理的。

日本的研究者铃木修次教授，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特性（楚辞与屈原传说）时说：“同《诗经》作品几乎都以‘无名氏’方式流传的情形相反，《楚辞》的多数作品是在屈原个人的名下被传诵下来的。”（载《学术研究动态》1981年第2期）这表明他对《楚辞》的主要篇章是屈原个人的创作有怀疑。但是，这还说得不够明确，所以，他又进一步说：“且不说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不能当作屈原个人之作，即使是同屈原关系最密切的《离骚》，是否如同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独创性的作品，也还存在问题。”（同前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《离骚》是屈原的个人之作，同时也就否定了屈原。铃木修次唯恐他个人的否定论不够有力，又举出同村繁（九州大学教授——译者迟公绪注）的《楚辞与屈原——英雄与作品分离论》为佐证。并且武断地说：“我认为，《楚辞》是从宋玉之后才开始有个人之作的。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，则是围绕屈原传说，经过了一个时期，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面成的文艺。”；（同前）这种说法就更加不符合中国文学历史传统的实际了。最后，他又拿出一个更加新鲜的观点，说什么“在南方的楚国，有一些歌唱悲愁的歌曲，犹如日本的‘长呗’。它们与屈原传说结合起来，以屈原这个人物为焦点，集约而成为今日之《离骚》。”（同前）试举日本的《土佐の子守呗》（载臼田甚五郎著《子守

唄のふる里を訪わこ》桜枫社出版）为例，全诗二十三行，在日本的“长呗”中也可算是长篇巨制了。但是，象这样的“长呗”，无论从它的结构上，还是从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，都远比不上《九歌》和《九章》。当然，就更不能说“犹如”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思想和艺术上都有独到之处的《离骚》了。

日本学人对于中国的国学尚欠熟悉，说些外行话，似乎可以理解。而有的中国的研究者，在撰写有关论文时也同样否定屈原，这就不能不令人遗憾了。但是，无论如何否定屈原，屈原也是否定不了的。他的《离骚》亦将伴随着他的光辉名字，永垂中国文学史册。

综前所论，“《离骚》的内容，即屈原为楚国为楚王的政治内容”。（《离骚发微》第127页）屈原的一生，也可以说是为政治和学术牺牲奋斗的一生，基于此点，说“与日月争光”，他是当之无愧的。

我读书时学过《离骚》，后来又教过《离骚》，但是，对于《离骚》的真义却了解得不深不透。此番撰写这篇戈戈小文，又反复拜读了魏炯若先生的《离骚发微》。深受启迪，获益良多、我想把拙文作为读《离骚发微》的点滴笔记，也许还是合适的。这样说，除表示不敢掠美之外，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表达我对魏炯若先生的跋慕之情，并以此就教于博雅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参加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《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》。

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

王重民《敦煌古籍叙录》载敦煌写本P. 3862《高适诗集》残卷佚诗三首：《遇崔二有别》、《奉寄平原颜太守》、《双六头赋送李参军》。兹依次逐录于后并试论析之。

遇崔二有别

大国多任士，明时遗此人。
颐颔尚丰盈，毛骨未合迤。
逸足望千里，商歌悲四邻。
谁谓多才富，却令家道贫。
秋风吹别马，携手更伤神。

奉寄平原颜太守并序

初，颜公任兰台郎，与余有周旋之分，而于词赋特为深知。泊擢在宪司，而仆寓于梁宋。今，南海太守张公之牧梁也，亦谬以仆为才，遂奏所制诗集，而颜公又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之。张公吹嘘之美，兼述小人狂简之盛，

遍呈当代群英。况终不才，
无以为用，龙钟蹭蹬，适负
知己。夫意所感，乃形于言，
凡廿韵。

皇皇平原守，驷马出关东。
银印垂腰下，天书在篋中。
自承到官后，高枕扬清风。
豪富已低首，逋逃还力农。
始余梁宋间，甘予麋鹿同。
散发对浮云，浩歌追钓翁。
如何顾疵贱，遂肯偕穷通。
耿介出宪司，慨然见群公。
赋诗感知己，独立争愚蒙。
金石谁不仰，波澜殊未穷。
微躯枉多价，朽木悬良工。
上将拓边西，薄才忝从戎。
岂论济代心，愿效匹夫雄。
骅骝满长皂，弱翮依雕笼。
行军动若飞，旋旆信严终。
屡陪投醪醉，窃贺铭山功。
虽无汗马劳，且喜沙塞空。
去去勿复道，所思积深衷。
一为天崖客，三见南飞鸿。
应念萧关外，飘飘随转蓬。

双六头赋送李参军

有物兮，四方故城，六面砥
平。白质黑文，花攒星明。
主张尔手谈，决断而心争。
推得失，似关乎天命；而消
息，乃用乎人情。若行之尤，
思之精。虽邂逅而小比，必
指掌而大亨。李侯李侯保令
名！无怨~~攸~~于垂成。朝影入
平川，川长复垂柳，明年有，
一掷分，君不先鸣谁先鸣。

唐代，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。唐诗发展到盛唐，边塞诗已形成颇有影响的一大流派，以高适和岑参为杰出代表，诗史上常‘高岑’并称。高适作为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，他的诗不仅反映了边塞生活和风光，开拓了唐代诗歌广阔的题材和崭新的思想境界，而且在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关怀人民生活等方面也有较大影响。所以，高适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，不但是一个边塞诗人，而且是一位政治诗人。

知人论世，从高适的身世和遭遇便可了解他作为一个政治诗人的抱负和感伤。涂元渠《高适岑参诗选注前言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说：“高适，字达夫，《旧唐书》上称他为渤海蓆（*tiáo*，今河北省景县）人，约诞生于公元七〇二年。祖辈做过大官，其父曾任韶州长史。高适早年‘性拓落，不拘小节，（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）。二十岁时，赴京求官，自以为‘举头望君门，屈指取公卿，（《别韦参军》），然而现实偏不使他如意。于是北上蓟门，漫游燕赵，想在边塞

寻取报国立功的机会，结果也没找到出路。高适长期浪游于梁、宋一带，遭遇蹭蹬，生计艰窘，一度‘以求丐取给，（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）。在此期间，他曾与李白、杜甫等人在齐赵一带饮酒游猎，怀古赋诗。后来寓居淇上。天宝八载（749年）由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，高适举有道科，授封丘县尉。他因不能忍受‘迎拜长官’、‘鞭挞黎庶’的精神痛苦，不久便辞官而去。”

在遭遇蹭蹬，生计困窘的二、三十年间，高适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，对现实有比较深刻的感受。他写了大量杰出的边塞诗，热烈歌颂保卫边疆的战争，反对非正义的战争；注意反映民间疾苦，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；通过称道良吏和指责暴君、抨击朝廷权贵来表达他关怀人民的思想。此外，还写了不少怀古、赠别的名篇佳什，流露了他怀才不遇、报国无门的愤懑和浪游时期的痛苦情绪。这些感怀怀才不遇的诗，反映了即使在“家给户足，人无苦窳，四夷来同，海内燕然”（《通典·选举典》）的盛唐时代，在那上升的封建社会里，大批人才仍然是不得任用，尤其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，更难找到政治出路。敦煌残卷高适佚诗第一首《遇崔二有别》，是一首典型的伤不遇的诗。

崔二，多家注释均为“生平不详”。结合高适另有《效古赠崔二》与《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县城作》两首诗来看，疑崔二即崔二少府；或为楚丘尉，与作者（曾授封丘尉）同是宦游人。所以，相见旋别，多有共鸣之处。

“大国多任士，明时遗此人。”大国，指当时的大唐帝国。明时，即圣明之时，这是对当时皇帝以及朝政的溢美之词。遗，在这里作“遗弃”解。此人，指崔二。这两句是说，在大唐帝国多方选贤任能的形势下，在当时皇帝和朝政

圣明之时，而友人崔二竟被无情地遗弃了。这对“大国”和“明时”是一种无情的讽刺。

难道崔二此人已经衰朽了吗？不。他“颐颌尚丰盈，毛骨未合迤。”颐颌，即下巴。此处指脸，即面颊。丰盈，即丰满。宋玉《神女赋》：“貌丰盈以庄姝兮，苞温润之玉颜。”毛骨，指外表和内里的机体。未合，不应该，即“还没有到……时候”。迤（tǐn），行动迟缓的样子。这两句，以千里马喻崔二。说此人年富力强，身体健康，并没有到行动迟缓的时候。“逸足望千里，商歌悲四邻”。逸足，犹言捷足。傅毅《舞赋》：“良骏逸足，踔捍凌越。”比喻才能超逸的人。商歌，古音歌曲，调多凄怆怨慕。这里引申为“影响”。这两句是说，崔二不但有着超人的才能，而且在当时的士人中颇有影响。犹如能行千里之马，它的凄怆歌声能使四邻皆悲。

最后四句：“谁谓多才富，却令家道贫。秋风吹别马，携手更伤神。”集中感喟象崔二这样富有才华的人，却使它家道贫寒，政途多舛；在萧索的秋风中相遇而又分别，紧握双手，无言以慰，唯有更加“伤神”而已。

这首诗写出了作者对友人崔二的同情（其实是相互同情），表现了他们宦游之人的命运是相同的。诗作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封建鼎盛时期的大唐帝国，仍有不少贤能之士凄惶不知所往，从而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权贵。当然，对当时的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，作者未提出怀疑，有一定的局限。在艺术方面，以良骏比喻贤能之士，取譬生动形象，极为妥贴。

高适这种感伤不遇、指责权贵的愤懑情绪，在《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》与《效古赠崔二》诗中均有所反映。如

“相逢俱未展，携手空萧索”，“缅怀当途者，济济居声位；邈然在云霄，宁肯更论蹶。周旋多燕乐，门馆列车骑；美人芙蓉姿，狭室兰麝气；金炉陈兽炭，谈笑正得意”等，就是明显的例证。据《旧唐书》本传记载，高适这种敢于反对权贵的精神，在他任侍御史和谏议大夫时，更发展为“说言义色”、“负气敢言”，终至使“权幸憚

第二首《奉寄平原颜太守》，约作于公元753或754年，也就是天宝十二、三载。时高适在哥舒翰幕府掌书记。

全诗共四十句，可分为八节。

第一节，自“皇皇平原守”至“天书在筐中”，共四句。写颜公（即颜真卿）走马上任的威严和声势。皇皇，美盛的样子。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丞丞皇皇”。平原，指今河南省一带。守，本秦代一郡的长官，后世用为刺史、太守等的简称。这里指颜真卿为平原太守。驷马，指四马一乘之车。此处借以说明颜太守地位之显赫。关，指函谷关，因平原在函谷关之东，故称关东。银印，指太守所佩之印。天书，即皇帝的诏书。这一节，写颜公出任平原太守，银印在腰，天书在筐，乘驷马车驾而去。真是功名显赫，美盛一时。

第二节，自“自承到官后”至“逋逃还力农”，共四句，歌颂颜公卓著的政绩。高枕，是“高枕而卧”的略语。清风，指清明的政治。逋逃，逃亡的罪人。《书·牧誓》：“乃为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，是以为大夫卿士。”这节是说，自从颜公到平原任太守之后，平民百姓安乐无忧，豪富之家也俯首贴耳，就连从前逃亡的罪人，都被感召而回来用力务农了。

第三节，自“始余梁宋间”至“遂肯偕穷通”，共六

句，写颜公礼贤下士，与作者友善往还。梁宋，古地名，高适浪游之地。麋（jūn，即獐子）鹿，此处指美食野味。“散发”二句，指作者清闲安适而又自由自在的隐者生活。顾，顾惜；眷顾。疵贱，有毛病的微贱者。偕穷通，即与困窘者通融。这一节诗，写作者浪游梁宋期间，颜公对行似隐者的他，能够“麋鹿同”、“顾疵贱”、“偕穷通”，突出赞颂了颜公礼贤下士的精神。

第四节，自“耿介出宪司”至“独立争愚蒙”，共四句。写颜公于私品格均甚高尚。耿介，光大，正直。《楚辞·九辩》：“独耿介而不随兮，愿慕先圣之遗教。”出，即出任。宪司，指朝廷委驻各行政省的高级官吏。群公，指颜公的同僚或上司。赋诗，指“颜公又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之”愚蒙，愚鲁蒙昧者，此系作者自谦之词。这一节写颜公被擢拔出任宪司之职后，对上司和同僚诸公总是慷慨愤激，而对作者高适却是赋诗相赠。

第五节，自“金石谁不仰”至“薄才忝从戎”，共六句。写作者仰慕敬佩颜公并自惭形秽。金石，此处比喻坚贞的品格。仰，抬头望，此处引申为敬慕。波澜，喻政治斗争。殊未穷，言特多而不已。微躯，作者自指。多价，即高价。朽木，亦作者自喻。悬，本为“悬挂”之意，此处引申为“选中”。良工，即能工巧匠，此处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。上将，亦指哥舒翰。拓边西，即开辟西部边陲。指哥舒翰指挥的边塞战争。薄才，亦高适自谦之词。忝，辱，有愧于。《诗·小雅·小宛》：“夙兴夜寐，无忝尔所生。”从戎，指作者参加军伍，充哥舒翰掌书记。这一节，写颜公在政治斗争中能经受住考验，锻炼成金石般的品格，深为人们（包括作者自己）仰慕。作者自己却被哥舒翰“谬以为才

而选中，追随大将拓边，充掌书记，真是有辱军伍，有愧于戎行。

第六节，自“岂论济代心”至“弱翮依雕笼”，共四句。济代，即有益于时代，并以救助社会。匹夫，泛指寻常人。《韩非子·有度》：“赏善不遗匹夫。”雄，喻杰出而强有力的人。《汉书·东方朔传赞》：“其滑稽之雄乎！”骅骝，骏马。此处喻贤才。满长皂，谓长槽上的良骏已满，极喻贤才之多。弱翮，软弱的翅膀。此处喻无力奋飞。雕笼，装有金玉等雕饰的鸟笼。此处喻哥舒翰幕府。这一节诗，写作者有“济代”的政治抱负，立志做一个杰出的强者，渴望在战场上杀敌立功；然而，“贤才”已经满员，况且自己的力量又不强大，只好依附于哥舒翰，在他的幕府做一个掌书记的随员了！

第七节，自“行军动若飞”至“所思积深衷”，共八句。极写哥舒翰的军旅声威，以及作者希望和平罢战的心情。若飞，形容神速。旋旆，指军旗飘摆。信，真的。投醪，此处比喻与士卒共甘苦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裴松之注引文：“观其所以结物情者，岂徒投醪抚寒、含蓼问疾而已哉！”铭山功，指汉唐时为标记战功，而在燕然山（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赛因诺颜部境内的杭爱山）勒碑刻铭，以志胜利之事。此处借喻哥舒翰拓西成功。空，此处指和平而无刀兵。深衷，即内心。这一节诗，从哥舒翰行军神速，军旗飘扬，军容严整，写到作者作为掌书记，也和哥舒翰一块与士卒共甘苦，终于取得了可以暗自庆贺的胜利。自己没有什么特大的功劳，可是看到了西部边疆的和平而高兴。这是作者最大的希望，也是最大的安慰。还有很多肺腑之言，就不再说，暂时深藏在心里。

第八节，自“一为天崖客”至“飘飏随转蓬”，共四句。作者借写自己的处境和身世，寄托相思和友情。天崖客，指作者在西陲哥舒翰幕府为客。三见，极言所见次数之多。这一组诗，作者慨叹身为天崖旅客，思乡念亲心切，看见南飞的大雁；希望它们能为自己捎书带信给颜公，告诉他可不要忘记了萧关以外的处境正象随风飘转蓬蒿的老友啊。

《奉寄平原颜太守》一首，全诗主题明确，重点集中于“虽无汗马劳，且喜沙塞空”二句。诗作富有深沉的现实主义精神。当然，高适作为一个封建文人，对于战争的认识，不象敦煌歌辞中那样明确。对于唐、五代的战争，敦煌歌辞有歌颂和反对两种态度，以反对为最突出。敦煌反战歌辞，反映了唐、五代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阶级斗争，特别是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，反映了人民反对不义战争的思想。敦煌反战歌辞也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祖国，反对侵略战争的强烈要求及对永久和平的火热愿望。其深刻的思想意义，超越了同时代的文人诗词创作。高适的诗歌自然也不例外。

第三首《双六头赋送李参军》。李参军，生平不详。参军，官名。唐代诸卫及王府官、外府州均设录事参军，掌各曹文书、纠查府事等。李参军为作者友人，此赋乃送其赴任之作。

全赋可分为五节。第一节，“有物兮……花攒星明”，共五句。赞誉李参军赴任之地城池美好。白质黑文，是说白地儿黑花。城平如砥，且“白质黑文，花攒星明”，自然是很美好的了。

第二节，“主张尔手谈……乃用乎人情”，共六句。写李参军的权位以及他的重要作用。“手谈主张”，即指起草文

书。“心争决断”，即考虑决策。表面看来，这“得失”似乎是“天命”，其实，它也不外乎“人情”。进一步强调了李参军权位的重要。

第三节“若行之尤……必指掌而大亨”共四句。写作者瞩望李参军率先垂范，为人楷模；遇事三思，对人要进行考查，做到全面了解，办事才能顺利通达。行，所作所为，即品行。邂逅，不期而会。这一节是作者的临别赠言，希望友人有好品行，遇事要多思考；虽然是邂逅相遇的人，也要小予考查；对人只有了如指掌，才能达到顺利无阻的大通境界。

第四节，即“李侯李侯保令名！无怨敝于垂成”二句。进一步嘱咐友人李参军，在事业垂成之际，要沉着冷静；不要有任何怨敝（shèn，笑也），要保持自己的名誉。

第五节，“朝影入平川……君不先鸣谁先鸣”，共五句。这一节写别途中朝阳、平川、垂柳诸景物，以及作者祝愿李参军努力奋斗，马到成功。一掷分，此处指决胜负的政治较量。以上五句，总写对友人的衷心祝愿。

全赋虽无瑰丽多彩的风光，却有朴素的哲理。语言通俗易懂，不以藻饰为工巧，不以雕琢为能事。写的是眼前平常的景物、心中诚挚的感情。直抒胸臆，明白如话，能于骈语之中出顿宕，给人一种厚重可爱的印象。

高适的边塞诗，主题并不局限于边塞，其思想内容很广阔，艺术风格则骏爽而豪迈。他的诗除人们称道的《燕歌行》、《别董大》、《自淇涉黄河途中作》、《东平路中遇大水》、《封丘作》等代表作外，敦煌卷中的高适佚诗同样也是好诗篇。特别是《遇崔二有别》和《双六头赋送李参军》二篇，集中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读书人由于政治上的愿望不得实